

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 170 周年 学术研讨会

论文汇编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东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东莞市虎门镇人民政府

主 办

鸦片战争博物馆

承 办

2009 年 6 月 25-27 日

东莞 · 虎门

目 录

鸦片祸害与林则徐禁烟的辉煌成就	萧致治	(1)
虎门销烟与民族正气——鸦片战争后中国精英分子救国观念的发展	林家有	(13)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林则徐使粤的再认识	姜 涛 邱志红	(31)
虎门销烟若干问题述略	刘炳元	(43)
试述鸦片战争前后上海的鸦片走私	苏智良	(51)
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医药价值研究	王宏斌	(66)
林则徐广州禁烟与美国人的关系	邵 雍	(84)
关于西南地区禁烟运动与抗日战争关系的认识	秦和平	(93)
林则徐的政治品质与虎门销烟	崔萍萍	(107)
林则徐的庄严使命与虎门销烟壮举		
——纪念虎门销烟 170 周年	戴学稷 徐 如	(115)
再论鸦片战争前夕的“弛禁派”	丁学志	(121)
略论鸦片战争与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衍变	黄顺力	(128)
印度鸦片生产与消费述略 (1600—1900)	连 东	(137)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林鸿汉	(149)
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兼论闽剧舞台上的林则徐	林 岷	(153)
清季的鸦片专卖	刘增合	(165)
浅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的主要禁烟法令	曲庆玲	(187)
走近林则徐	吴之俊	(198)
试论林则徐在江苏禁烟	萧忠生	(213)
浅释销烟在虎门的历史源由	谢 滨	(220)
武汉沦陷时期日伪的鸦片毒化活动与社会危害	张笃勤 陈一平	(233)
浅析林则徐在缴烟问题上与十三行商的斗争	张巨保	(249)
鸦片走私与中外茶贸易——鸦片战争前后的考察	《提纲》 郑剑顺 朱 蔚	(261)
关于律劳卑事件的不同解读——从律劳卑纪念碑谈起	郑永福 李道永	(263)
近代转型期前中国最后一代中上层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重新审视林则徐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朱季康	(277)
鸦片战争前白银外流问题的再考察	吴义雄	(282)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丛报》关于鸦片贸易的讨论	何文平 赵 莹	(294)
林则徐与广州靖海门销烟	卜穗文	(310)
略论林则徐的禁烟策略	张建雄	(312)
探讨“虎门销烟”在世界禁毒史上的地位	唐立鹏	(323)

鸦片祸害与林则徐禁烟的辉煌成就

武汉大学 萧致治

虎门因林则徐销烟而名闻世界。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流芳百世。170 年前，即 1839 年，虎门海滩的两个大销烟池中，共计销毁鸦片 237 万多斤，乃是中国禁毒史上的空前壮举，世界禁毒史上的一块丰碑，也是林则徐一生最辉煌的成就。

一、 鸦片祸国殃民

鸦片在近代中国，是一种祸国殃民的毒品。人们吸食鸦片，无异于慢性自杀。鸦片泛滥，不仅损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而且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的灾难。当时广州有位学者陈澧写了一首《炮子谣》，对吸食鸦片造成的严重祸害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

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
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
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
君知炮打肢体裂，不知吃烟肠胃皆熬煎；
君知火烧破产业，不知买烟费尽囊中钱。
呜呼！太平无事吃鸦片，有事何必怕炮怕火箭？（1）

这首炮子谣，把吃鸦片的祸害比喻成胜过大炮火箭千百倍，并非言过其实，而是确实如此，甚至严重得多。因为它毒害的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成百万上千万人。据 1728 年（雍正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苏明良奏报：一些不法分子“用小铜锅将鸦片炮制成膏，然后将烟丝入内拌均，晾干为烟。又截竹为筒，内贮棕丝，以便呼吸。乃私设馆舍，聚集数人，成群结党，相依枕席，循环递吸，夜聚晓散，夜夜如是，从无间断。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更难枚举。是以少年子弟易堕其术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昏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虽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是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是鸦片危害地方匪浅鲜矣。”（2）这里讲述的

是雍正年间的情况。那时输华鸦片不过两百箱，造成的祸害已如此严重！到了道光年间，每年输入两三万箱，其祸害何啻万倍！

吸食鸦片，首先是毒害了吸食者。鸦片中含有吗啡等 20 多种生物碱，具有强烈的麻醉作用，是一种特殊毒品。少量服用可以止咳镇痛，止泻、提神。服用日久，毒性浸入人体各个部位，致使体形逐渐蜕变，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面色灰白，瘦骨嶙峋，眼神无光，精神萎靡不振，全身有气无力。到了烟瘾发作，肌肉颤抖，坐卧不安，呵欠连天，呻吟不断，变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被人称为鸦片烟鬼。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吸鸦片者估计有 250 万到 300 万人，散布全国各地，尤以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最为严重。当时名人程恩泽在一首诗中自注说：“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³⁾ 凡是吃鸦片烟者，一个个都变成了伤生耗财的废物。不但严重伤害身心，而且吸食致死者时有所闻。1816 年春，江广生北上参加会试，因烟瘾发作，死于考场。“瘾发死场屋，直等道路殍。”⁽⁴⁾ 另外还有一个官奴，喂养了一只猴子，吸烟时常常带在身旁，这只猴子同样深受毒害。后来这个官奴因吸鸦片死了，猴子也跟随死去。⁽⁵⁾ 1834 年（道光十四年），香山郑云巢在北京充当舍人（文书），和一个年纪才 18 岁的情侣韵香同居。为了满足性欲，两人一同吸食鸦片。郑云巢不久中毒死亡。三天之后，其情妇也跟随死了。⁽⁶⁾ 居住在上海近郊的曾羽生，在《日记》中记述说：自从清朝初年李成栋攻陷上海之后，“官兵无有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以来，吸之者十分中几居六七。青村南门，黄君显三子吸烟于盐锅之左，烟醉后浑不自主，翻身入锅立死。”⁽⁷⁾ 此类惨剧，可悲可叹，不胜枚举。

其次是给吸食者的家庭造成严重的祸害。鸦片是一种昂贵的物品，明代价格与黄金相等。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每箱（100 斤）鸦片最贵的卖到两千多圆，最便宜的也要 500 圆左右。因此吸食鸦片所耗费的钱财难以数计。林则徐当年曾估算过，吸鸦片的人每天除衣食日用外，每天至少要花一钱银子吸鸦片。一月合计要三两。一年就是 36 两。家中的钱财有尽，而鸦片的消耗无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必然导致倾家荡产。鸦片的另一种特性是“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吸食很容易上瘾。上了瘾就不容易戒除。当时曾有人指出：“世间无论何物，从未有食之成瘾，如鸦片魔力之伟大者。”

⁽⁸⁾ 乾嘉时代人俞蛟说，上瘾之后，“每日非如期呼吸则疾作，俗呼为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豸虎逼于后，亦惟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⁹⁾ 这些瘾君子把吃烟视为生活第一需要。手中钱财不足，宁可不吃喝，也要过烟瘾。“吃烟成瘾，除死方休”，成了当时的流行语。他们为了弄到过瘾的钱，已经到

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当时有一首歌谣说：“最毒是鸦片，害人真毋浅，哪个上了大烟瘾，逼得卖屋又卖田！”瘾君子为了弄到买鸦片的钱，先是变卖家业。家产卖尽之后，就卖儿鬻女，最后把妻子也卖了，或者逼迫妻女为娼。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一个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全因吸食鸦片给破坏了。社会上流传一首歌谣，生动地道出了吸鸦片者家庭的悲惨下场：

面黄肌瘦精神少，有病了，
身上穿件破烂袄，底丢了，
不论干湿就睡倒，瘾发了，
妻室儿女哭嚎啕，不管了，
父母无病逝故早，气死了；
不完钱粮不纳草，地卖了；
赤身露体到处跑，拆光了；
日窃夜盗人人恼，不远了；
走在野地尸难找，狗吃了。（10）

四川宜宾城周某，原来富有家产，“一家十口人，除老母外，全家人烟瘾很深。十余年间，‘万贯’家财荡尽。长子以盗窃诈骗为生，本人亦靠亲友周济度日，其次子还未成年，即成一副骷髅。将近 20 岁还未通人道就死了。这是吸食烟毒的悲惨下场！”（11）

第三、鸦片泛滥，给社会治安、生产、生活等带来广泛的影响。吸食鸦片的人，在倾家荡产之后，为了弄钱过烟瘾，往往丧尽天良，干尽了坏事。他们在倾家荡产之后，行诈骗，做小偷，强抢恶要是常有的事。有的甚至结成黑社会，干尽罪恶勾当。“凡染上大烟者，多大的家产都随烟雾而去，难于谋生，妻离子散，狼狈万千。无烟可吸之时，往往铤而走险，小则偷盗抢劫，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大至聚众占地为王，割据一方，……地方政府对此视而无睹，无可奈何！”（12）今年 6 月 3 日，武汉大学发生一起持枪劫持人质事件，罪犯周凯就是一个吸毒者，并且加入黑社会组织，2008 年曾因非法劫持人质，犯了非法拘禁罪，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此次劫持事件，据武汉市公安局化验歹徒尿液呈阳性。案发后还在他家里搜查出 200 多颗麻果，证明周凯是因吸食麻果过量后精神亢奋，产生幻觉表现出异常反应。据当时在现场参与处置的民警介绍，谈判专家赶到后，周凯就一直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一直在说话，没有住过嘴。当时谈判专家发现，周凯并没有明确的诉求，思维逻辑都是混乱的。一会儿要求见校领导，一会儿要求见初恋的女友，一会儿要求见记者，未涉及工作和经济上的要求。根据周凯与谈判专家交谈

中提到“有几百人要追杀我”的情况，极有可能当时他因吸食麻果产生幻觉，随后做出了种种异常的反应。周凯与劫持的女干部也无任何过节，劫持人质的动机为非报复性。劫持对象也具有极大随意性。

除了破坏社会安定外，对社会上的生产和生活也造成极大影响。在当年生产不发达的情势下，广大人民连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多缺钱购买，商业贸易由于购买力低下十分有限。而自从鸦片泛滥全国之后，这种低下的购买力又受到严重挤压。正当商品交易由于缺乏资金而严重萎缩。据林则徐在亲身做过官的苏州、汉口等地查看，二三十年间，商业衰落将近一半。他说：“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阑闕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13）鸦片盛行非但排挤商业贸易，而且对工农业生产也造成重大破坏。鸦片盛行之后，一些原来种植粮棉的土地，而今变成罂粟种植田。正常农业生产受到排挤。而且吸食鸦片者，一个个成了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社会寄生虫。这些人既不为社会生产财富，却消耗了大量钱财，致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多方面破坏。如果按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以 280 万人计，约等于当时中国人口的千分之七。也就是说，有千分之七的人完全成为社会的负担。

第四、鸦片大量输入，掠走无数白银，给中国财政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早在 1833 年，林则徐就和陶澍在奏报中指出，外国鸦片贩子以输入鸦片换取内地纹银，乃是“大弊之源”。（14）自从鸦片通过走私大量输入中国之后，多是以现银购买。从此，白银由流入转为流出。鸦片贸易盛行之前，欧美各国没有中国需要的大宗商品输入中国，却需要中国产的大量茶丝。为了平衡中西贸易，不得不运来大量白银，换回中国茶丝。马士说：“在整个 18 世纪期中，实际上主要运进广州的是金银，一面用以补充进口货的不足，一面用作购买茶丝、维持商馆、供应船只和应付官吏的苛重勒索等的基金。”（15）据马士估计，在 18 世纪到 1830 年的 130 年间，在广州白银进口的净数估计不能少于 9000 万到 1 亿英镑。（16）按照当时 1 英镑等于纹银 3 两计算，1701 年到 1830 年，共计输入白银达 2 亿 7 千万到 3 亿两。可是，由于因鸦片掠走大量白银，从 1827 年起，白银开始大量外流。据统计，1830 — 1831 年度，白银输出达 3887972 两，合 5399961 西班牙元。1833 — 1834 年度，输出白银 4340589 两，合 6028596 西班牙元。（17）而据吴义雄在《关于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探讨》一文中核计，每年掠走的白银均在一千万西班牙元以上。最多的 1836 — 1837 年度，掠走银元高达 18691529 元，折合纹银为 13457900 两，相当于当年清朝户部银库年均收入的 99% 以上。茶叶是当时中国输出的

主要产品。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中译本第381页记载，1833年贸易年度输往英国的茶叶值是8712701元，只相当于同年鸦片值的59%。正是因为鸦片掠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才造成中国银源枯竭，银价上涨。三十年以前，铜钱一千文，可换白银一两；到了鸦片战争前，则需铜钱一千五六百文，才能兑换纹银一两。银贵钱贱，不仅使清朝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而且给广大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诚如黄爵滋在1838年的名奏中指出的，鸦片以烟土换白银，“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18）

最后，清朝各级官吏和军队弁兵吸食，腐蚀了整个统治机器，严重威慑着清朝的统治。当时鸦片被一些人视为高档消费品。吸食者，其初不过少数纨绔子弟，“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19）官吏中吸食鸦片者，“京官不过十分之一二，外官不过十分之二三，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至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20）军队中弁兵吸食者也很多。这些人吸食鸦片，导致清朝吏治更加黑暗，军队益发丧失战斗力。因为官吏吸食的银钱，都是靠向人民巧取豪夺。广东的各级官吏，无不从鸦片走私中分肥。英国的外交文件中说：“鸦片贸易虽在条文上是违法的，但广州的当局，上自总督，下至税吏，都与这种贸易有关，因而纵容‘中国人民’（按：中国走私贩子）自外国船只上将鸦片取走，以后甚至将官船借予转运鸦片。”（21）“水师得自月饷者十之一，得自土规者十之九。”（22）巡船本来是为巡查鸦片走私而设，实际上“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23）兵弁吸食鸦片，严重影响清军的战斗力。1832年，清军开赴湘粤边界镇压瑶民起义，由于士兵吸食鸦片，连吃败仗。

由上可知，鸦片的祸害，不光害了吸食者本人及其家庭，而且危及整个社会及国家统治，以致民族的生死存亡。诚如魏源依据黄爵滋奏折所概括的，鸦片“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

（24）

二、道光前期禁烟，越禁越多

清朝禁烟，始于1729年（雍正七年），历经乾隆、嘉庆而至道光，共计四个朝代。其中雍正、乾隆两朝，只禁兴贩开馆，未定吸食罪名。鸦片作为药材，仍许纳税进口。自从1796年（嘉庆元年）起，“因嗜者日众，始禁止入口。”（25）1820年，复禁止国

内种植罂粟。1813 年，由于连年在北京发现侍卫官员吸食鸦片，嘉庆帝谕令刑部议定买食鸦片烟罪名，开始用刑法禁止吸食。但由于吏治腐败，禁令不行，禁者自禁，吸者自吸。鸦片通过走私，仍然大量进口。据印籍学者谭中统计，1795—1800 年，平均每年进口 2043.5 箱。到 1811—1820 年，增到 4405.5 箱。

在四个朝代中，道光帝禁毒是最认真的。他和历朝历代皇帝相比，不算英明之主，却是一个力求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生于 1782 年，十岁时随乾隆帝在威逊格尔打猎，射中一只鹿，得到乾隆的嘉奖。1813 年，天理教起义军冲入皇宫，当时嘉庆帝不在宫内，他调来火器营狙击，且亲自用鸟枪击毙两名起义者，事后嘉庆帝赞许他有胆有识。1820 年 9 月 2 日（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死去，由他承继皇位。时年 38 岁，正值盛年。不过，他继承的却是“一个荒淫而腐败的朝廷，一个无组织而贪污的政府，以及被叛乱弄成百孔千疮的帝国。”⁽²⁷⁾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即位后，大力整顿吏治，整理财政，尤致力于严禁鸦片。他力崇节俭，“其俭德实三代后第一人”，超过汉文帝和宋仁宗，“素被称为小康熙，很想励精图治。”据说他年轻时也吸过鸦片，且快成瘾，忽有所悟。果断地说：“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²⁸⁾乃立刻将烟膏弃去，其进呈烟具之太监某立毙杖下。他的意志之坚决，为古今罕见。由于他认识深刻，所以从即位起，就将禁烟作为一项重要政务，一直厉行严禁政策。综观道光前期的禁烟情况，从 1821 年到 1838 年，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21 年至 1823 年。道光帝一上任，即提出“鸦片流传内地，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下令各省实力查禁。三年间，他共发布了五道禁令。内容包括：1、严查山西太谷、介休等地富商大贾贩卖鸦片牟利，下令将贩卖之人拿获，按律治罪；2、洋行总商伍敦元与众商通同徇隐，让鸦片私运进口，下令摘去三品顶带；3、密令两广督抚查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并令各省关隘一并严密查拿；4、令两广总督阮元等实力查禁纹银出洋及鸦片进口，不得徒托空言。令阮元与粤海关监督达三对通海各个口岸及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毋任员弁稍有捏饰。倘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立即从严惩办；6、酌定失察鸦片烟条例：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如果得故纵，仍照例革职；若止失于觉察，按其烟价多寡，给予处分。武职失察，参照文职划一办理。7、云南西部把罂粟花熬为鸦片，必须严禁。⁽²⁹⁾根据加强严禁精神，制定了查禁新法令：“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³⁰⁾

在道光帝的严令下，两广总督阮元采取措施，查办了叶恒澍贩烟等 6 起烟案。洋行

总商摘去顶带后，于 1821 年 11 月 12 日向外人发出通告：停泊黄埔的鸦片船必须即刻离开；此后外国商船只有出具没有夹带鸦片的甘结，才能做该船的保商。自此以后，鸦片船不再停泊黄埔，转移到了伶仃洋面。鸦片走私史上的黄埔时期宣告结束。这阶段禁烟只是一个开端。据统计，1821 年至 1823 年度，共计走私进口鸦片 18304 箱，共重 1830400 斤。而查获的鸦片仅 127 斤多，另加 26 块。查获数和进口量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第二阶段：1829 — 1834 年。这六年中，道光帝共计发布有关禁烟谕令 12 道。(31) 内容包括：严禁鸦片进口及纹银出洋；严禁内地卖种鸦片烟，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各督抚即责成该管道府督饬所属实力查禁。每年乘抽查保甲之便，于春季赴各乡稽查一次，将有无私栽鸦片烟出具印结，年底由司会齐咨部。并着各督抚于每年具奏编查保甲折内，一并详晰声叙；通令各省严禁弁兵吸食鸦片烟；由于兵丁吸食鸦片烟，连州进兵不能得力，罚两广总督李鸿宾赔偿三成军需银两，从重发往乌鲁木齐效力续罪；令闽浙总督严饬水陆文武各官认真查哨，毋许夷船闲入内洋，并严饬检查口岸，不准一人一船行驶出口拢旁夷船，接济贩卖；令两广总督派拨巡船二只，在夷船湾泊洋面常川巡查，一切疍民艇只，均不许拢近夷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济。倘有土棍驾驶快艇向夷船兴贩鸦片及私卖货物，即查拿解究，从重治罪。并责成营县派拨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昼夜轮流巡缉。令地方官访拿开设窑口土棍，查抄严惩。

根据道光帝的上述谕令，1831 年有 15 个省的督抚把查察情况作了覆奏：种卖鸦片烟的只有浙江、云南、四川、广东四省；福建泉州虽曾种过，近来并无种植；其它各省都说现在尚无私种罂粟花熬烟贩卖之事。道光帝收到各地复奏后，又谕令各省于每年春秋两季督促所属道府州县在编查保甲时亲赴各乡，留心查察，按季稟报，并出具并无种卖鸦片的切实印结。各督抚在年终时要汇报一次。到了 1832 年底，各省遵令汇报的只有陕西等 8 个省区。都说没有种植。陕西、湖南、直隶、山西四省说有兴贩。湖北则说不能保其必无。河南则说间有买卖兴贩。根据这两年各省的奏报情况，似乎形势大好，种卖鸦片的甚少。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据道光十年六月御史裘元俊揭露，“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罂粟遍地。”而据外国资料记载，1829 — 1834 年共走私输入鸦片 113305 箱，平均每年输入 18884 箱。而这六年查获的鸦片则只 3 起，共收缴鸦片 903 斤。(32) 缴获数不及输入数的万分之一。

第三阶段：1836 — 1838 年。这是查禁鸦片切实加严时期。本阶段道光帝共发布有关禁烟上谕 73 道。其中尤其集中在 1838 年，计 60 道。(33) 在这些谕令中，命令查拿

烟贩烟商的 20 道，惩办贩烟的 11 道，奖励禁烟出力官员的 9 道，惩办禁烟不力官员及吸食鸦片烟的宗室贵族和官员的 13 道。谕令各省妥议查禁章程的 9 道。本阶段初期，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提出弛禁主张，公开建议放弃严禁政策，提议照药材纳税，准许外商输入鸦片；不许官员、士子、兵丁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无论；准许内地栽种罂粟。内地栽植日多，外国鸦片便会不禁自绝。许乃济的主张，完全无视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健康，立刻遭到朱嶟、许球和袁玉麟等人的严正驳斥。道光帝接受他们的意见，决定进一步推行严禁政策。于是命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对鸦片问题进行彻底调查，拟订一个切实可行的严禁计划。1837 年，邓廷桢遵令首先采取驱逐趸船措施。声言如不将趸船遣返回国，将实行封舱，停止交易。其次是谕令各地查拿兴贩鸦片烟的窑口和烟饭。1838 年 5 月 15 日，吏科给事中陶士霖奏陈查禁鸦片，非议以重刑，不能挽此积习，建议将囤贩、吸食鸦片各条例，从重议加罪名。6 月 2 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吸食者，建议规定期限，限令吸食者戒烟。过期仍然吸食者，处以死罪。道光帝令各省督抚就黄爵滋奏折“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34）围绕黄爵滋的建议，各省督抚很快作出回应。在 29 位大臣的覆奏中，有林则徐等 8 位赞同黄爵滋的意见，并提出一些补充建议。其他 21 位认为对吸食者处分过重，同时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没有一人主张弛禁。道光帝在这一年中，目睹鸦片祸害深重，几乎是集中全力禁烟。在一年之内发布 60 道禁烟上谕，可谓空前未见。最后到了年末，他又谕令禁烟卓有成效的林则徐晋京，8 天之内，连续召见 8 次，商议禁烟相关事宜。最后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希望将烟禁绝，“积习永除，根株断绝。”（35）

总观道光朝前期的禁烟情况，道光帝禁烟的态度是坚决的，禁烟的法令也日趋完善。但效果却很不理想。据谭中统计，1821 — 1830 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 11423 箱，而 1831 — 1840 年，则增加到 24355 箱。平均增长一倍多。其中 1837 — 1838 年度，居然输入达 3 万箱以上。为什么会越禁越多？首先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禁烟，使用各种手段把鸦片走私运入中国，引诱人们吸食；其次是清朝吏治腐败到了极点。各级官员大都从鸦片走私中获取利益，不但禁令无法推行，反而千方百计包庇走私。禁令有名无实，烟何能禁！

三、林则徐禁烟的辉煌成就

在当时的官场上，林则徐是一位勤政清廉的著名能吏。他从 1820 年起，先后在浙

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做过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整饬吏治、兴修水利、赈灾济贫、整顿钱漕和盐务等方面，政绩卓著，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也受到道光帝的青睐。禁烟则是他一生最突出的政绩。

和同时代人相比，林则徐对禁烟认识最深刻，态度最认真，成果最辉煌。他在青年时代，曾在烟毒泛滥最早的厦门做过刀笔小吏，亲眼目睹了鸦片的毒害，自然早有感触。1823年，林则徐出任江苏按察使，就把严拿奸民、取缔烟馆作为一项重要政务。1833年，他在江苏巡抚任上，根据当时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所造成危害，就尖锐指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为了根除这个对国计民生造成大害的鸦片，他主张“密饬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再于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立，庶可杜根株而除大害。”（36）这表明他在五年之前，已经把鸦片之害，不是停留在风俗人心，而是提到妨碍民生国计上来考虑。同时在查禁措施上，已把断绝来源作为首要任务。而且对牟利之奸商，以及包庇走私之兵役，都要加倍重惩。

到了1838年，黄爵滋提出重惩吸烟者的建议后，为了贯彻公平原则，他在赞成重治吸食的同时，补充提出，兴贩开馆的人，也要一并重惩。同时强调：要真正贯彻重惩原则，“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37）这也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过去之所以越禁越多，毫无效果，其重要因素就在于官员弁兵贪赃枉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致徒有禁烟之名，毫无禁烟之实。林则徐对禁烟的认识，这时又提高了一步。在同年9月《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他尖锐地提出，当前鸦片祸害已严重到如此地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38）兵丁和饷需，是维护清朝统治两个最重要的基础。这两项都因鸦片祸害而削弱殆尽。清朝统治和民族生存，都将无法维持。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还能等闲视之吗？正是由于他认识深刻，才有不顾一切，认真查禁烟毒的切实行动。

当黄爵滋奏请重惩吸食者之时，林则徐正在湖广总督任上。他接到道光帝的上谕后，不到十天就覆奏表态支持，并提出更全面的严禁章程。此外，又附上戒烟药方，帮助吸食者戒烟。与此同时，他不待定议，即在两湖地区雷厉风行地查禁鸦片。果然，在短期内即获得前所未有的成效：“湖北全省收缴烟枪数千杆，烟土烟膏数万两；湖南也收缴了烟具数千件，烟土烟膏三万多两。在严厉禁烟的声势下，许多吸食者纷纷自行戒烟。武昌和汉口各家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涨

价数倍’。吸食者戒烟之后，健康迅速恢复。一些老鸦片烟鬼，抽了三十多年鸦片，一天吸到一两，戒烟之后，‘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禁烟不但挽救了许多吸食者，同时促进了家庭的和睦与团结。”（39）

道光帝一方面从林则徐的奏报中进一步认识到鸦片的严重祸害；另一方面又为林则徐在两湖禁烟的成效所鼓舞，认为“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40）正是由于林则徐的杰出表现，道光帝才决定召他进京，当面商议禁烟大计。经过多次咨询，在第六次接见中，就正式确定委以重任，派林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趁此可乘之机，力救前此之失。总期吸食永除，根株断绝。”（41）为中国祛此大患。

林则徐不负重托，于 1839 年 3 月 10 日抵达广州后，立刻采取几项重大措施，谕令英美等国烟贩缴烟，同时在广东全境展开禁烟工作。首先是展开调查，摸清底细。其次是先礼后兵，令十三行行商转告英美烟贩，自动交出囤放在趸船上的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此后再不贩卖鸦片。三是饬拿大烟贩颠地。四是在外国烟贩拒不缴烟的情势下，果断地下令包围商馆，停止交易，迫使他们交出鸦片。围馆封舱以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原准备顽抗，后来看到继续抗拒，不会有好结果，才于 1839 年 3 月 27 日递上禀帖，同意交出趸船上的鸦片 20283 箱。林则徐在勒令收缴外国烟贩鸦片的同时，又在大佛寺增设收缴烟枪烟土总局，收缴广东各地鸦片。伶仃洋趸船上的鸦片于 5 月 18 日缴清，共计 19187 箱，又 2119 袋。核之原数多出一千袋有零，总计 237 万多斤，于 6 月 3 日至 23 日在虎门销烟池中全部销毁。

虎门销烟是禁毒史上一个空前伟大的胜利。当时主政的道光帝，赞扬是“除中国大患之源”，“可称大快人心一事。”（42）马克思赞扬是中国政府 1837 年采取严禁措施以来的“顶点”。远近前来观看的群众亲眼看到万恶的鸦片全部销毁，“无不肃然凛畏”。此前在华外商中“许多人声称中国人将不会销毁一斤鸦片”。待亲自考察了虎门销烟之后，不得不赞叹说：“我们已把销烟过程的每一个部分都反复考察过了。他们在整个工作中那种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不能设想还有什么别的能执行得比这项工作更为忠实的了。”（43）

林则徐一举从外国烟贩手中收缴 237 万多斤鸦片并进行彻底销毁，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从 1729 年首次禁烟以来，整整 110 周年，从来没有收缴过这么多鸦片，更没有从外国烟贩手中收缴过鸦片。雍正一朝，只收缴过鸦片 33 斤。乾隆一朝，没有收

缴鸦片的记载。嘉庆时代，零星查获一些吸食者，查到少量烟土烟膏，总起来不会超过10斤。道光元年查获的六起烟案，收缴的鸦片共只127斤加26小包。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共只查获鸦片903斤。1837年至1839年春，即林则徐抵达广州前，据统计，全国收缴的鸦片共只53569斤多。（44）只相当于收缴外国烟贩鸦片的2.3%。另外，林则徐到达广东后，在广东各地还收缴了鸦片35599斤，超过了此前除广东外各省收缴的总和。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拿这些数字略作比较，即可知道：林则徐在广东查缴到的鸦片，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成就。

再从世界全局来考察，虎门销烟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的一块丰碑。林则徐不愧为世界禁毒的先驱。当时，鸦片毒害已扩展到世界各地。印度尼西亚已因荷兰殖民者引诱吸食，遭到了亡国弱种的命运。东南亚其它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鸦片的毒害。英国早在17世纪已有人警告，食用鸦片，“就会每天处在死亡的痛苦之中”。“没有任何药物能解开时间鸦片的毒性。”（45）美国在独立前，已存在鸦片问题。独立战争期间，敌我双方的军队更加依赖鸦片。美国独立之后，种植罂粟的州日渐增多。那时由于药用鸦片致瘾而服用鸦片的已流传相当广泛。可是，各国对禁鸦片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当时大张旗鼓地严禁鸦片的只有中国。查禁鸦片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只有林则徐。所以，说林则徐是世界禁毒的伟大先驱，中国乃至世界禁毒史上的历史伟人，一点也没有夸大。

注：

- 1、广东文史研究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78：307。
- 2、宫中档·朱批奏折，马模贞等：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4。
- 3、4、5、6、7、8、9，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一，上海：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300、295、295、296、312、307、296。
- 10、11、12，《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烟毒写真，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568、158、329。
- 13、林则徐全集编委会：林则徐全集·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78。
- 14、同上·一：269。
- 15、16、2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30、231（注4）、243。
- 17、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33。
- 18、19、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国一档：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55。
- 20、蒋湘南：与黄爵滋鸿胪论鸦片书，同上，《鸦片战争》一：483。
- 21、伦敦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鸦片战争》二：645。
- 22、夏燮：中西纪事，长沙：岳麓书社，1988：281。
- 23、24、25、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 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169、168、
168 — 169。
- 26、谭中：中国和蛮横的新世界（英文本），1978：85。
- 28、雷瑨：蓉城闲话，同前：292。
- 29、31、前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一：32 — 51、55 — 167。
- 32、据前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一：86、145 及近代中国烟毒写真：337 等刊载数字统计。
- 33、据前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一：198 — 472 页所提供谕旨综计。
- 34、35、同上：258、432。
- 36、前引林则徐全集. 一：268。
- 37、38、前引林则徐全集. 三：35、79。
- 39、萧致治：林则徐在两湖的政绩，鸦片战争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241。
- 40、41、42、前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一：364、432、611。
- 43、虎门销烟，前引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85 — 89。
- 44、据前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一，各省奏报的数字统计。
- 45、马丁. 布思：鸦片史（任华梨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38、36。

虎门销烟与民族正气

——鸦片战争后中国精英分子救国观念的发展

中山大学 林家有

1839年6月3日到2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在广东收缴的英国、印度、美国商人的鸦片约237万余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表明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正气。虎门销烟本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行为，但英国则以此作为借口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开创了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恶例，表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但也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使士大夫开始正视西方的霸道与中国王道之间的道德差异，开始思考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寻找中国与东西方列强之间的真正差异和复兴中华的途径。所以，鸦片战争既是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又是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的新契机，并由自在民族实体向自觉民族实体转换的新起点。

一、“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表面看来是因为中国禁烟，其实早在此之前，西人在华创办的刊物，以及英国本土都在制造对华动武，强迫中国改变对外贸易管理体制^①的侵略预谋。鸦片战争是中英，乃至中国与西方必然要产生的一种摊排。这场战争是先进的西方，欺凌落后的东方的不义之战。从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9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想征服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深重的苦难和屈辱，但中国人始终没有被征服。从征服与被征服的角度去看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与中国人较量中始终都是失败者。这是“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的表现。^②

（一）在中英对打中，中国战败是由于我们落伍

^① 参见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是英国 H. N. Shore 评论容闳时写的文字：“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参见钟叔河著《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英国是第一个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华帝国大门的侵略者，在列强争相瓜分中国的种种罪恶活动中，英国始终充当着侵略中国的主凶或帮凶角色，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爱国运动与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

所谓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贩卖鸦片这种毒品引起的战争。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一种获利最丰的上等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从乾隆初年到嘉庆初年，每年约 400 箱（每箱约百斤），增加到四千箱。到道光年间鸦片的输入增加更快，道光元年（1821 年）输入的鸦片只五千箱，到道光十五年，就增加到三万箱。这种特殊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不仅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更重要的是危害了中国人的身体，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从乾隆、嘉庆到道光都颁布法令禁止鸦片入口。但是禁烟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鸦片不仅是通商的大利，也是印度政府收入的大宗。我们要禁烟这本来是中国主权内的事，别国无权干预，但蛮横霸道的英国希望维持鸦片贸易的现状，我中国则力图禁绝。英国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中国，中国为了维护主权和尊严，也不顾一切地应对英国的挑衅。就这样彼攻我守，反反复复。英国不讲理，我们讲理也没有用，只好用战争来对抗。这场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称为通商战争。蒋廷黻称为“东西对打”。^⑧所谓“东西对打”，就是你打我，我也打你。在这场对打中，我们被打败了。而失败的根本原因，蒋廷黻说是因为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为什么会失败？蒋廷黻说：“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⑨蒋氏说的也是。由于中国人的守旧观念太重太强，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有的人缺乏新思维看不出中国的问题所在，有的人看到了问题的某些方面，又不敢指陈出来，有的人看到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但不敢行动，怕清议和行动带来祸害，更加不敢提倡对中国进行改革，耽误了中国转弱为强的光阴。然而这是一个方面，但也有另外一方面，而且是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慢慢地觉醒了，对于外来的夷人有所了解，并逐步找到了对付外夷的办法。

（二）对付夷人侵略的办法是在战略上藐视他

^⑧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 页。

^⑨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第 34-35 页。

早在 16 世纪初期，刚刚到达中国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在广州沿海进行贪得无厌的掠夺和残忍的暴行，引起人民的痛恨，因而广东人称这些殖民者为“番鬼”。鸦片战争后，外国人都被广州人看成是“难以驾驶的番鬼”，把他们视为好斗、野蛮、吵闹的“外夷”。这不是广州人的“排外”偏见，而是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形象的一种解释。^② “番鬼”就是外国鬼，这明显是带有情绪化的贬称。鸦片战争前，广州人对于外商一般还能友好相待。鸦片战争后，对于外国人广州视其为“蛮夷”。对西人中的女性，广州人称其为“番鬼婆”、“番妇”^③，称西餐为“番鬼餐”^④，称西语为“鬼语”。对于这些“番鬼”的蔑视，现在看来当然不好，但在那个被西人欺压的年代，敢于对别人蔑视也是一种自信和自己拥有力量的表现。

我们不提倡复仇，但也不主张当洋奴走狗，人家欺侮你，你还要充当奴才，这是没有志气的表现。广东人接触西人最早，它比较了解西方，也能体谅到西人的傲慢和骄横，一般说来广东也不“排外”，广东人讲信誉，讲包容，但广东人也有一种倔强的性格，它不示弱，也永不言败，如你欺凌他、压迫他，他也有一种永不屈服的个性。在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亨特（William C·Hanter）是一位在中国生活长达 40 年的美国人，他对中国，尤其是对广州人有较多的了解，因他在 1829 年就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任职，1842 年退休，1844 年返回美国。其后他又回到中国，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活动达 20 年，并创设了亨特洋行。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广东，尤其是对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有较多的了解。他在《旧中国杂记》书中对 1841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有过深刻的记述。他写道：

当英国军队在 1841 年开到广州城外时，人民的好奇心异乎寻常。
房屋顶上、江边的街上，到处挤满了大群的中国人，都要争睹这群奇怪的魔鬼。当英国船只停泊在城市前面通澳门水道上靠近沙面的地方时，它们的图形被刻在木板上，印成无数份，在城里城外到处贩卖，每张不到半个便士。在那雄壮的帆桁顶端，站在一个穿上个世纪外国服装的夷人，没有任何依傍，满不在乎地站在那里用望远镜看着。……尽管这支

^② 参见[美]威廉·C·亨特著：《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本书于 1882 年初版，1911 年和 1938 年两次再版，1954 年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 2 部分“鸦片战争前英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收入南开大学林树惠教授摘录本书部分内容，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又出版了由冯树铁的全译本。

^③ [美]威廉·C·亨特著：《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第 89 页-90 页。

^④ [美]威廉·C·亨特著：《旧中国杂记》，广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7 页。